

血染灵山

——两位幸存者的忆述

□曹景广



灵山西侧(灵山抗日主战场)。

团政委张咨明。

一营营长王子衡。

招远灵山矗立于招远西陲，海拔323米的山巅虽不算高峻，却见证着中华儿女的抗争史。

战前风云，山雨欲来

1939年11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十四团移防至此，团部驻扎在灵山西麓冯家村，三营驻守东麓西山王家村一带，二营驻守曲城村附近，成为胶东抗日的重要屏障。彼时，北海银行、抗大军校胶东分校、灵山采金局等众多军政机关分散驻扎在周边村落，灵山成为守护胶东抗战命脉的关键节点。

1940年6月，日军发动“六一”大扫荡，纠集多地日伪军，矛头直指灵山。战前，十四团团长李希孔竟临阵变节，潜往掖县向日军泄露驻防军情，致使我军陷入被动，抗战胜利后于潍坊被依法惩处。

5月31日，日军在朱桥南岭集结，十四团一营曾派30余人夜袭骚扰，拂晓安全返回，却未察觉敌军3000余人三路合围的险恶图谋。6月5日夜，一营再次袭扰敌营，返程后战士们正用餐，一场生死决战已悄然逼近。

灵山鏖战，铁血阻击

6月6日凌晨，朱桥、掖城、黄县等多路日伪军携带大炮、机枪、马队等，在灵山周边完成集结。黎明时分，南岭哨兵发现敌踪，团部紧急部署：一营营长王子衡率一连及半个三连(二连外出打麻雀战，三连半数留守北海银行)抢占灵山顶高点；通信员火速通知机关转移，二营掩护团部北撤，三营在东侧打狙击。团政委张咨明、副团长宋子良亲率警卫连上山，决心死守灵山的转移争取时间。

清晨7时，枪炮声划破寂静。日军先以马队试探，遭战士两枪击退，随即以炮火覆盖山头，兵分两路围堵西南与南部，东面亦架起枪炮，形成合围。拥有丰富经验的王子衡与教导员刘一希见我力量悬殊，提议按游击战原则撤退，却遭宋子良否决：“没有我的命令，谁撤退就枪毙谁！”宋子良随即带警卫连抢占东南山头，张咨明则率部守着围子山山顶，阻击敌人的东侧攻势。

上午8时，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轮番攻打西坡，被战士们击退，半山腰尸横遍野。敌军随即合兵强攻东南山头，宋子良此时察觉难以支撑，想下令突围却已错过时机。北山的区中队因战力薄弱而失守，一营抽调一个排的兵力坚守至下午4时。张咨明见战局危急，命敌工站长王理民带机密文件突围。王理民率20余人沿东麓沟壑潜行，最终成功抵达南孙家村，成为少数突围成功者。

王理民撤走后，张咨明在围子山凭险据守，多次击退东路日军。日军随即调整部署，增兵猛攻三连防守的东南山头。三连连长鲁光带领战士，在每人仅20发子弹、3颗手榴弹的情况下，连续打退三次进攻。弹尽粮绝后，战士们以石头御敌，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在“多杀鬼子为国尽忠”的呐喊中，鲁光与全排战士壮烈牺牲，宋子良亦在突围途中殒命于半山腰，其牺牲之英勇被幸存者铭记多年。

制高点失守后，日军机枪横扫各山头。敌人叫嚣“抓活的”，二人相拥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鬼子竟浇汽油焚尸，姜崇伦当场碳化。刘一希被老乡救下后，在剧痛中骂了三天三夜的鬼子，终因无医无药而牺牲。

时至正午十一时，日军再度发起围攻。此时我方战士已死伤过半，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剩余将士仍浴血奋战，予敌重创。副团长宋子良、三连连长鲁光及三连全排战士已在南部山头全部殉国，军需处处长王吉山身负重伤却依旧坚守阵地。仅剩的12名战士毅然冲入敌群，以枪托、大刀、石头乃至牙齿与敌人肉搏，终因寡不敌众相继倒下。

张咨明望着山下合围的敌军，深知突围已万分艰难，却不愿让剩余战士白白牺牲。他紧皱眉头，果断下令让重伤的王吉山带领大部分战士突围，王吉山急道：“你是政委，要保存党的文件，该你下！”张咨明厉声喝道：“啰唆什么！文件已妥善处理，快带战士们走！”

突围的突破口选在大韩家村东的湾泉沟(又称“庵前沟”)，张咨明率留下的战士掩护。王吉山带领战士冲下山西坡，却遭遇敌军五挺机枪封锁——韩家小山顶、东南山、石头谷、庵前沟北岸骷髅石、南岸土崖等，都在交叉火力的严控之下。战士们数次突围均告失败，伤亡惨重，被死死困在庵前沟的上游。彼时十四团装备匮乏，唯一的轻机枪在王吉山手中。子弹耗尽后，他将机枪沉入水中，转身欲攀爬土崖夺取敌人机枪，却遭另一处敌军扫射，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其余战士中，部分侥幸冲出险境，在青纱帐的掩护下经过洼村、李格庄村向北撤离。

午后一点多钟，笔者13岁的哥哥从山后冯家村姥爷家返回曲城。行至石门沟时，遇见十余名满身泥土血迹、神色慌张、背着长枪的年轻人。打头的小伙子急问：“小同志，前边是

什么村子？”听闻是山后冯家、白家等地后，他们急忙道谢：“我们是灵山上打仗突围出来的！”便匆匆向北而去——这正是跟随王吉山突围成功的战士。

战斗初期，驻守灵山东部龙王庙山顶的第六区中队队长冯汉民企图逃跑，遭队员王德忠怒斥：“我们吃穿皆靠老百姓，怎能临阵脱逃！”冯汉民遭谴责后独自潜逃，后变节投敌，1947年被人民政府依法处决。王德忠、杨义增、冯功堂则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为国捐躯。

此时的山上，我方人员已所剩无几，仅余张咨明与十余名警卫员在山西坡掩护突围，北部山头上还剩一营营长王子衡和部分幸存战士。

灵山中段西麓的山岔处，有一处方圆200平方米的坳地，旁边有一条庵前沟，张咨明计划带领仅剩的8名战士从沟中突围。但沟口被骷髅石与南岸的机枪交叉封锁，水坑中躺满王吉山部的牺牲战士，唯有跨过水坑方能依托沟堰掩护体避险。

张咨明率先抡着双匣子枪跃出，迅速蹲在掩体下，待机枪停火便招呼战士跟进。可年轻战士缺乏经验，心生畏惧，犹豫间遭机枪击中。张咨明只得返身回沟，对大家说：“留在此地唯有等死，闯过去才有生机！”他先后三次示范跳跃，仍有战士未能掌握要领。他不愿独自逃生，第四次返回时，腿部中弹负伤，四出四进的突围终未成功。大批敌军涌来，张咨明与剩余战士在反击中壮烈殉国，这一幕被大韩家村的幸存村民亲眼看到。

战斗持续至下午4时，我方虽多次击退敌军冲锋、予敌沉重打击，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团政委张咨明、副团长宋子良及近200名战士血染灵山。王子衡的通信员，司号员均已牺牲，他自己腿部负伤，仍坚持射击，最终利用深沟射击死角隐蔽，待敌军撤退后只身幸存。次日他收拢部队，仅集结起40余名伤残人员，其余将士皆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日寇惨无人道，躲藏在山上的群众亦遭屠杀，灵山冯家村就有四人遇难。其中包括两名十来岁的孩童，或被枪杀，或被刺刀捅死。

第七区中队队长、灵山东乡营部部长冯宝忠在安排好村民与民兵转移后，迅速登山参战。他熟悉地形，本欲转向北山，途中遇乡文书冯延令，得知北山失守的战况后，二人分头寻机歼敌。战斗后期，冯宝忠藏身于庵前沟茂密的爬松之下，被日军骑兵的马尾扫过头顶，还目睹了鬼子枪杀藏在另一棵爬松下的两个孩子。幸得集合哨声响起，鬼子仓促离去，他才逃过一劫。也正是在此期间，冯宝忠亲眼见证了王吉山为掩护战士突围、奋勇争夺敌军机枪的壮举，目睹了张咨明抡枪杀敌、指挥突围的临危不惧与视死如归。双区战士王岐山在龙王庙阻击日军时英勇牺牲，冯延令则殉难于龙王庙后。日伪军进攻山头的同时，部分敌军闯入灵山冯家村，名为搜寻八路军，实则大肆劫掠。他们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对未来得及转移的老人、病人肆意毒打，临走时还牵走3头毛驴、6只山羊及多只鸡鸭。下午4时许，日寇清查战场后，抬着伤员，用72匹马驮着144具尸体，向东南方向逃窜。

英魂安息，青史留名

鬼子撤走后，当天傍晚，邻村群众哭喊着亲人的名字涌上灵山，搜寻幸存者、救助伤员。他们踏遍山的每个角落，将尚有气息的伤员抬回家中，包扎伤口、煎药喂饭。看到烈士遗体血迹斑斑、面目全非，众人悲愤交加、泣不成声。灵山冯家村村民找到杨义增的遗体，执意要抬回家安葬，他的父亲却拒绝道：“他活着时与战友并肩战斗，死后就让他和战友们作伴吧！”

6月7日，上级党组织召开会议，部署伤员转移与烈士安葬工作，灵山以东由老赵乡负责，以西由灵山东乡负责。6月8日清晨，灵山冯家党支部组织群众，在乡长李进忠、乡营部部长冯宝忠、各教会会长冯维梓等人的带领下，登上灵山收殓烈士遗体。大家小心翼翼地将遗体抬至墓地，擦洗血迹、整理衣裳。冯维梓从战士遗物中捧出掺着野菜的菜团与高粱面饼子，痛哭道：“这就是我们的烈士生前吃的东西啊！”因鬼子封锁扫荡，加之天气炎热，烈士们大多未能用上棺材，许多人甚至没留下姓名。灵山西麓庵前沟堆起了31座坟墓，合葬烈士100余名；灵山东麓西山王家村与柳杭村的沃土上，安葬了40余名烈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60年清明节前，招远县民政局与灵山人民公社联合将十四团近200名英烈的遗骨，从他们守望了20年的灵山上迁出，移葬至招远县西山烈士陵园。

胶东英雄儿女浴血灵山、抗击倭寇，用年轻的生命铸就了不朽的革命丰碑。这份精神永远镌刻在胶东人民心中，永远载入中华民族解放的史册。

(本文参考灵山战役幸存者、十四团一营营长王子衡的回忆文章《八路军的灵山突围》和招远县第七区中队队长冯宝忠的《灵山战役演讲稿》编撰而成)

史前文化也称原始文化，是指文字产生以前的人类文化，即石器时代的文化。一般说来，在中国，史前文化是指夏朝之前的文化。由于夏朝之前没有文字的真实记载，所以对史前文化的考据只能根据文物遗迹作出历史判定。考古发现，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人类在牟平土地上繁衍生息，对这些遗迹的考古发掘，为我们展示了牟平的史前文化。

早期的贝丘文化

大海，是早期海洋文化的摇篮。生活在海边的原始人群，通过捕捞和采集，获取了丰富的食物资源，留下了大量的蛤、螺、牡蛎等贝壳及鱼类的刺、骨废废弃物，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堆积如丘，考古学家把这类遗迹叫作“贝丘遗址”。这些贝丘遗址，除了厚厚的贝壳，还埋藏着当时人类居住的房址、墓葬和各类生产、生活用具，形成了独具海洋特色的贝丘文化。牟平的气候受海洋调节，昼夜温差小、无霜期长、湿度大，陆生资源和海洋资源都十分丰富，非常适宜人类的生存和居住，因此，贝丘遗址较多。

牟平的贝丘遗址主要分布在离海不远的丘岗高地，如蛤堆顶遗址、许家疃遗址、艳阳塔遗址、大荆子岗遗址、砬砬塔遗址等。这些遗址与海岸线近似平行排列，形成了牟平早期的聚落群，生活在这里的先民，被称为“贝丘人”。文博工作者通过对贝丘遗址中规模较大的蛤堆顶遗址和砬砬塔遗址进行解剖发掘和科学考察，发现并了解了牟平贝丘人的生活状况。牟平贝丘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6000—5000年前，与中国考古史上的“大汶口文化”时代相近。

蛤堆顶遗址

蛤堆顶遗址位于牟平区大窑街道蛤堆后村正南由东向西倾斜的一个台地上，东西长320米，南北长350米，总面积约182000平方米，是胶东半岛较大的一处贝丘遗址，也是环渤海环境考古的重要发现，是研究胶东半岛史前文化的重要资源，1979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保单位。

蛤堆顶遗址现为农田，东部、北部略高，西部、南部略低，文化层厚1至2米。1979年3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烟台地区文管组曾对该遗址进行过调查。199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研究课题组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确认这是一处典型的贝丘遗址，遂于1995年10月进行了试掘，并在遗址范围内进行了钻孔勘探。

根据钻孔勘探，蛤堆顶遗址的人工遗物主要是石器、陶器和骨器。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灰褐陶为主，泥质陶较少。器型主要有圆锥形足鼎，带各种耳的罐、支脚和钵等。石器有石斧、石锤、石磨盘、石磨棒等。骨器有骨锥等。

蛤堆顶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中，贝类占大多数，此外还有鱼类和哺乳动物。贝类有多形淮栖螺、脉红螺、牡蛎、文蛤、蛤仔、毛蚶等，鱼类有鲭鱼、红鳍东方鲀、黑鳞等，动物骨骼有猪獾、家猪、梅花鹿等。

根据研究，遗址附近的植物，乔木有冷杉属、桉木属、松属、桦属、胡桃属、栎属、椴属、榆属、枫杨属等，灌木及草本植物有榛属、蒿属、菊科、藜科、伞形科、杜鹃科、禾本科等，蕨类及藻类植物有石松属、卷柏属、水龙骨科等。

砬砬塔遗址

砬砬塔遗址位于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姜格庄村东南的向阳坡台地上，海拔20多米，1964年在整地改土时被发现。遗址中心在坡地最高处，向东1000米为驻马神山，南部边缘为一条西流的小河，北与黄海相距约5000米。遗址东西长540米，南北长56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

1995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研究课题组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遗址文化层最厚处2米左右，内含大量的贝壳、兽骨、红烧土块等。在遗址南侧接近中部的断崖处，可见遗址的剖面。剖面划分为五层：第一层为耕土层，厚26厘米，浅黄色土，土质疏松；第二、三、四、五层均为含贝土层，但土层厚薄、泥土颜色、含贝数量各不相同，第四、五层含贝量较少，第五层以下为黄色生土。

砬砬塔遗址的遗物以陶片、石器、骨器为主。各类陶片中夹砂红褐陶最多，此外还有灰褐陶等。这些陶器纹饰简单，仅有泥突装饰，余皆素面。陶器均为手制，器形主要为鼎、罐、支脚等。各种陶器保存完整，造型优美，其他地方少见，极具文物价值。石器有斧、锛等。骨器有骨锥等。

砬砬塔遗址中的动物遗存，主要是贝类和哺乳动物骨骼两大类。贝类有各种蛤、螺、牡蛎等，动物骨骼有猪、梅花鹿等。

砬砬塔遗址面积较大，也是研究胶东半岛史前文化和环渤海环境考古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200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在对蛤堆顶遗址、砬砬塔遗址的挖掘、考察中发现，当时牟平贝丘人的生产、生活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各遗址中都有不少红烧土块，一面为平面，另一面的断面上留有密集的行排列的细圆木痕迹。据此分析，当时的房屋应该是一种木骨泥墙建筑，这些红烧土块应该是房屋被意外焚烧后泥墙倾颓留下的遗迹。这显示出当时人们的定居生活已初具规模，构筑的房屋已经不是简单的窝棚，而是十分坚固的地上建筑，这说明贝丘人的居住条件是比较先进的。

贝丘遗址中发现了由长石英岩、云母变粒岩、云母片岩等天然石块略经加工而成的网坠和一些鱼骨，说明海洋捕捞已经成为贝丘人的一项重要生产活动。这些石网坠的出土地点，一面连接纵横岭及茂密山林，一面毗邻大海。可能是人们就近从山林中取天然石块进行加工，再到沿海进行渔业生产活动。

从遗址中发掘出土的鱼类骨骼中发现了红鳍东方鲀。这种河豚素有剧毒，须先除去内脏和血液，冲洗干净，方可食用。可见贝丘人在当时就已经掌握了如何清除有毒成分后食用这种方法。

在许多贝丘遗址的地层中，都发现了动物

的残骨和炭化的榛、橡等植物的果实。可见狩猎和采集也是贝丘人的生存手段。贝丘人猎取禽兽后，除食用它们的血肉外，还用它们的毛皮缝制衣物御寒，用它们的骨骼制作工具。同时，贝丘人还采集野生植物的根、茎、叶、果实，尝试作为食物。

遗址中发现了数量众多、形状各异的陶器，其制作与使用都能从侧面折射出贝丘人生产生活的丰富多彩的方方面面，也揭开了他们迈向新时代的新篇章。

石器依然是贝丘人使用的主要生产工具之一，其质地、打制方法和用途不尽相同，可见在当时，贝丘人已经学会利用不同的石质和不同的加工方法制作不同用途的各类石器，做到因“石”制宜。

在距今约4000年前，延续约2000年的胶东贝丘文化开始消亡。据研究，在距今约6000年时，冰川融解，大量水流涌入海洋，胶东半岛附近的海平面比现在高4米左右。距今约4500年前，海水开始后退。而近3000年以来，海平面高度与现代相当，波动幅度较小。通过孢粉分析发现，当时的气候出现了由温暖湿润向寒冷干旱的明显转折。而生活在这里的贝丘人，正是处在这个转折期内。后来，随着自然环境的变

从历史遗迹中探寻牟平史前文化

□曲延科



化和农耕方式的推广，半岛贝丘人逐渐由捕捞、采集、狩猎等经济方式向农耕经济过渡，形成多种生产类型共存的混合型经济方式。

与贝丘文化相当的内陆文化

胶东半岛属丘陵地区，海拔较低，地形高低起伏，坡度较缓，低山矮丘连绵不断，有丰富的陆生资源。与沿海的贝丘人生活在同时代的半岛内陆人，引弓可以狩猎，掘地可以播种，秋实可以采集，其物资来源与海洋相比各有千秋。半岛内陆人虽然没有获得海鲜的营养，却得到了山珍的滋补。这一时期的人们，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可能略有不同，但他们奔向文明曙光脚步是一致的，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时代文明。

在发现挖掘贝丘文化遗址的同时，牟平先后发现了位于观水镇桥家村西、桃(村)乳(山)公路和进村大道相交处的桥家遗址，位于苕格庄镇泊而村西南约1000米的泊而村长行顶遗址，位于玉林店镇共和庄村西北约20米的共和庄村西遗址，位于水道镇卧龙村西约500米的卧龙村西遗址，位于苕格庄镇姚家村北、贵家庄村南山脊上的贵家庄村战家台遗址，位于牟平区玉林店镇北红石头村北约200米的北红石头村西遗址。通过对这些遗址的挖掘考察，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块和各类陶器、石器、骨器等。根据文物标本分析，这几处遗址距今都在5000年左右。除北红石头村西遗址外，其余5处遗址都是烟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岳石文化

1972年春，位于牟平城东南端的文化街道照格村村民，在村西开渠时发现了一处古代遗

址，考古工作者将其定为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4000年前，胶东属于东夷，生活在这里的部落在原始社会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东夷文化。这个文化的具体年代，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考古遗存，堪称最早的中国，是华夏文化的主流)为同一个时期，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这一文化最早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平度县东岳石村，所以史称岳石文化。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是这一文化的典型代表。

考古工作者先后对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进行了两次挖掘考察。

第一次是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烟台地区文管组联合组成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这次考古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2800平方米，取得了重要成果。

发掘出土的器物里，夹砂陶以褐陶为主，手制者居多，纹饰以附加堆纹为主，也有刻划纹、戳印纹等；泥质陶以灰陶最多，黑陶次之，多为轮制，器表磨光，盛行尖棱和子母口、空心磨菇形钮，纹饰以弦纹为主，彩绘装饰为空白色。陶器器壁较厚，器形有甗、罐、盆、尊、豆、器盖等。石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细，通体琢制，刃部锋利，讲求实用而不尚华丽。尤其是出现了一批独具特色的石制农业生产用具，其中特征最鲜明的有单面刃石铲、半月形双孔石刀、长方形多孔石耒耜等农具。骨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种类数量更为繁多，磨制更为精细，主要有骨铲、骨刀、骨匕、骨锥、骨针、骨鱼钩等，并且出现了有钻有灼的卜骨(祭祀用的工具)，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迈进了文明的门槛。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段完整的铜铎，表面锈蚀较重，剖面近三棱形，尖部锋利，经鉴定化验为青铜，是当时发现的世界历史上较早的金属器。遗址所采集的标本，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3600—3900年。

第二次发掘为2007—2008年。烟台市博物馆对照格庄遗址北部边缘进行了勘探发掘，又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首次对照格庄遗址上发现岳石文化与周代文化的叠压关系，将牟平周代文化的活动区域由城区扩大到照格庄遗址一带。1999年牟平顺正不夜城工地的考古发掘曾将牟平建城的历史由汉代提前到周代。

——在照格庄遗址首次发现岳石文化的窑址和壕沟，保存完好且密集，填补了该项考古空白。

——发掘出多个连续灰坑和直径在3米以上的硕大灰坑，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形态、聚落状况、生活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

——采集了大量的木炭、兽骨、硅酸体土样等标本。后续的实验室内分析、测定、研究，为测定照格庄遗址的年代、生态环境、动植物分布、气候变迁等提供了大量的可靠数据资料。

照格庄遗址发掘后，因其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时代单纯，成为胶东岳石文化的典型代表，被学术界称为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照格庄遗址于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工作人员在牟平区发现了30多处岳石文化遗址，分别分布在沿海一线、念河沿岸、广河沿岸、沁水河沿岸、鸟岛河沿岸、老清河沿岸、黄垒河沿岸等七个片区。南部昆嵛山腹地也发现了许多岳石文化遗存，其数量之多、密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的主要特点是：

1. 农业水平有明显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生产工具中农业工具的比重加大。这充分证明粟作农业经济在当时已占主体地位。饲养业在当时也很发达，出土的兽骨中，被鉴定出的有猪、狗、鹿等动物，而且多为工饲养的动物。这说明岳石人在进行早期渔猎活动的同时，已经把目光转向农业和饲养业，使经济形式更加多样化，以此来适应人口增长对物质的不断需求，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经济形态。

2. 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照格庄遗址出土的一枚长6.2厘米、直径0.5厘米的青铜锥，虽埋藏于地下3000多年，但锥尖仍不失锋利。这说明铜器在岳石文化中已经被普遍使用，人们对铜的性能、采集、冶炼都有了更多的了解。

3. 岳石人已经有了很高的审美观。这一点除了表现在石器和骨器的精美制作之上，还特别表现在陶器尤其是泥质黑皮陶上。粗笨朴质的泥质黑皮陶，是最具岳石文化特色的陶器之一。其器形多为尊、罐、器盖、三足罐等，多饰弦纹、凸棱纹、子母口，器盖上有磨菇钮，并有一定数量的彩绘，主要使用朱红和粉白两种颜色的矿料。

4. 文明程度已达到一定的高度。照格庄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卜骨，原料采用鹿、羊、猪等动物的肩胛骨，有灼有钻，钻孔排列比较整齐，说明这一时期的祭祀活动已经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根据碳14测试的数据，岳石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400年左右，其相对年代晚于龙山文化而早于商代早期偏晚阶段，应该是龙山文化的继承者。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制陶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陶器素以“黑、光、亮、薄”著称。举世闻名的“蛋壳陶”技艺，达到了制陶业的巅峰。但岳石文化并没有继承龙山文化制陶业的传统，单从岳石文化的陶器看，少了一点龙山时期的灵气，多了一点山野的粗犷与质朴。粗笨与精细并存、古朴与典雅齐驱、厚重实用是其主要风格。这说明，虽然岳石文化在时间段上是龙山文化的继承者，但其有自己的文化来源，即“夷人”特色，并非直接由龙山文化转化而来。而这一点，在牟平的岳石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